

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香港大学语言学系
戴昭铭 陆镜光主编

【第一辑】

语言学问题 论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香港大学语言学系
戴昭铭 陆镜光主编

【第一辑】

语言学问题 论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问题论丛 / 戴昭铭, 陆镜光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2
ISBN 7-108-02373-3

I. 语... II. ①戴... ②陆... III. 语言学 - 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690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 数 25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弁言 1

人类语言学学科定位简论

[美] 道格拉斯·帕克斯 著 周庆生 译 5

历史语言学在中国

——从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区分谈起并收尾 朱晓农 23

汉语和非亲属语言接触研究 周磊 34

现代汉语中“V-在了+NP”的兴起及其语法分析 屈承熹 56

汉语谓宾动词的配价研究 邵敬敏 王伟丽 84

所指判定与文本连贯的计算机处理 冯志伟 100

关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与流通度问题 张普 145

《史记》字频分析 李波 168

简帛本《老子》若干词语研究及其他 李先耕 186

全球化、英语霸权和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

——对英语扩张的人类语言学透视 戴昭铭 199

从双语和双言看香港社会语言变迁 陆镜光 213

东北官话的否定词 尹世超 221

黑龙江省肇源县站话双音节格的连读变调 陈立中 238

普通话儿童的语音习得 祝华 李菟 251

语言学问题论丛

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述略 270

编后记 276

稿约 277

弁 言

《语言学问题论丛》(第一辑)出版了。此前我们曾出版过《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反响还不错。这次书名更改,“问题”一词仍然保留,可见编辑宗旨没有变化:编者对于“问题”特别看重。因此,趁《论丛》启程,我们把原来作为宣言的《发刊辞》主要部分重新刊出,以使读者有所了解。

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谓由来已久。时距远一点的,如程朱理学中关于“饿死”和“失节”孰大孰小之争,近一点的,如改革开放之初“姓资”“姓社”之争,其实质都关乎问题和主义。当然最为著名的当数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分别径以“问题”与“主义”为派别标榜的那场论争。论争的结局似乎是以“主义”派的获胜证明了“问题”论之不足取,然而倘若撇开政治倾向不论,事情也并非像字面那样简单——“问题”还是“主义”?其实“问题”论者心目中本来就有“主义”(实用主义),“主义”论者目的其实在于解决问题(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分歧的关键其实在于改良还是革命。然而,历史的逻辑往往有点儿固执。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当中国社会改造的复杂性充分显示出来时,只要解决“问题”(“抓住耗子”)而不管什么“主义”(“白猫黑猫”)已成为人们的基本思想方法,“改革”(“改良”的近义词)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时,人们是否又意识到了当年的“问题”论派思想方法的某种回归呢?

我们在此并非想要评断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的是是非非,而是想借此说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并非语言学界才有。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创立以来已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如果从切音字研究算起,也已经有一

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与整个世界面貌的巨大变化相适应的是，无论是国外的还是中国的语言学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同19世纪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统天下，中国传统“小学”独步学界迥异其趣的是，当代语言学则是门户林立，流派纷呈。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认知主义等等，不胜枚举，有的大“主义”内还分小“主义”，比如结构主义就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描写主义之分，而词汇主义又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应用的需要和学科综合的进展，形形色色的语言学的应用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流派和分支学科既多，不仅提出的问题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更是路数各异，大相径庭。乱花渐欲迷人眼，隔派如隔山，语言学家看不懂他人的语言学论文，正是当代语言学兴旺蓬勃之写照。然而时至今日，各个流派和分支学科所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几乎是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种状况与节节进展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了鲜明对照。至于汉语分析使用西方的种种“主义”固然早已被称为圆凿方枘，然而中西结合的道路上至今仍是荆莽拦路，问题丛生。不要说一个初入此道的新手进了语言学界，既掉进了“主义”堆里，也掉进了“问题”堆里，甚至于不少老于此道的学者，也难免伴随“主义”与“问题”的困惑而终其一生。那么作为一本小小的论丛的编者，我们将如何面对“问题”与“主义”的如此纠葛呢？“主义”表现为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则是在一定的“主义”观照之下所提出来的工作任务。任何“问题”都有一定的“主义”为背景，任何“主义”总要解决一些别的“主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的“主义”和一定的“问题”共同构成了一定的“科学研究的范式”。诚然，夸夸其谈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主义”以及不纳入一定“主义”轨道的“问题”是不具备科学资格，进不了学术殿堂的。然而，由于世界语言种类之繁富，语言类型之复杂，语言本质之多样性和玄奥性，语言学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and 应用问题之形形色色，层出不穷，希冀任何一家即便是具有科学资格的“主义”来解决所有语言的分析问题和应用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主义”的语言学至多也只能解决它所提

出来的部分问题，它所遗留下来的力所不及的广大研究空间，只能有待其他“主义”去施展法力。如果以为某种“主义”一定能包打天下而加以尊奉，其结果不仅必然事与愿违，更要忽略甚至掩盖许多本该提出探讨的问题。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态度，奉行单打一的“主义”，从研究者方面看，也许还有某种“片面的真理”，而对于一本论丛的编纂来说，则肯定是有损无益。因此，本论丛的编纂，将绝不奉行一家“主义”，一种流派，一种方法，而只能兼容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如果说这样的宗旨也算是一种“主义”，那么就不妨称之为“中庸主义”。

“主义”既然不论，可见本论丛主要还是看重问题。那么对于“问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标准呢？本论丛规模虽小，但仍想对语言学科的研究略有裨益，因此在稿件的择取上，自然不能漫无标准。我们心目中有价值的问题至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真问题一定是大家都觉得是个问题的问题，假问题则往往是不是问题的问题。真问题的研究创造思想理论，假问题只能制造学术泡沫。

二、是新问题。不仅论题新材料新，而且结论具有创新性。我们不想炒作老话题，不过也欢迎对老话题作独到的新探索。

三、是前沿性问题。此类问题的研究具有启迪新知、深化认识、推进学术、积累知识的功能，我们尤为重视。

四、具有钩沉发覆性质的问题。此类问题的研究类似考古发现，材料的年代或已久远，得出的结论往往超绝前人。

至于是理论问题还是应用问题，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是共时描写问题还是历时演化问题，是内部语言学还是外部语言学问题，是宏观语言学还是微观语言学问题，是标准语问题还是方言问题，是语音、词汇、语义问题还是文字、修辞问题，我们都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当然，在具体语言方面，本刊主要关注汉语研究以及与汉语有关的语言接触问题和语言对比问题，但对于具有理论价值的其他语种的研究，也同样欢迎。

语言学问题论丛

衷心希望海内外学界同行关心本《论丛》，支持本《论丛》，协助我们把它办得更好。

《语言学问题论丛》编辑部

2005年9月

人类语言学学科定位简论^①

[美] 道格拉斯·帕克斯 著 周庆生 译

作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承蒙周庆生教授和戴昭铭教授的邀请，本人能出席首届中国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面对如林高手，发表演讲，十分感谢。鉴于人类语言学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中国各地的人类语言学家代表在此聚集，本人感到荣幸之至。作为国际《人类语言学》杂志的主编，我要说明，中国学者投给本刊的论文微乎其微。在本次大会召开之前，本人及大多数美国语言学家并不清楚中国是否存在人类语言学研究领域。今天能够亲临大会，发现中国人类语言学的存在，见证中国人类语言学的发展，实在感到非常高兴。

引 言

要了解现今世界大多数地区人类语言学这门学科，就必须知晓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两大学科的关系史，因为人类语言学是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人类语言学在较早较大学科中的定位通常不固定。由于学者个人兴趣不同，学术培训机构不同，人们对人类语言学的认识也会各不相同。

^① 本文系作者于2005年1月6日在中国黑龙江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的全文。收入本论文集前，作者曾作过修改补充。

另外，对于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人们惯常使用一些非标准化的术语，诸如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甚至社会语言学。使用这些术语，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很多人认为，这些术语都是同义词，可以替换使用；但另一些人则试图将这些术语区别开来，他们试图让不同的术语指称不同的文化语言研究方法。然而，即使人们努力区分这些术语，学者们对这种区分也是见仁见智，某人认为是语言人类学，别人则会认为是人类语言学。

我们要说的是，文化中的语言研究的重心和路径与社会中的语言研究的重心和路径是大相径庭的。规范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术语会非常有用。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期：美国人类学的发展 人们对美洲印第安语的兴趣及描写由来已久，但学术研究是 19 世纪的事。美国的早期研究大多属于比较研究，旨在为北美土著分类。最早从事这种研究的都是圈外人士。其中，艾伯特·加勒廷 (Albert Gallatin) 时任财政部长，他从印第安代理人、传教士及其他渠道收集到许多词汇和语法资料，并据此率先完成了当时 (1836, 1848) 一部美洲印第安语分类法。沿着加勒廷的路子，约翰·韦斯利·鲍威尔 (John Wesley Powell) 于 1891 年推出的综合分类法盛极一时。鲍威尔是一位地质学家，曾任史密森学会民族学局 (即后来的美国民族学局) 负责人，兼管西部诸州的地质测量。在后来的 50 年甚或更长时间内，鲍威尔的分类法一直是从事美洲印第安语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试图在鲍威尔确立的 55 个语系之间建立联系并最终减少语系数目的基础。

与此同时，作为自然科学新学科的人类学正在不断发展，其发展环境是，在创建大量的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过程中，开发出大量的人类学项目。19 世纪后叶的博物馆有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美国民族学局、纽约市美洲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这些机构特别是美国民族学局朝气蓬勃，完成了很多人类学项目。这些项目大多以全美洲的部落调查为基础，搜集了史前文物和现代文物，记载了民族志和语言，从而提供了一幅从史前时代到与欧洲人接触时期南北美洲大陆人生活的全景图。通过博物馆的田野调查，在对看来

正在消失的土著文化资料的记录中，语言记录成为其中主要活动之一。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语言学论文”、美国民族学局的“公告与年度报告”、“加州大学民族学与语言学论著”等出版论丛来看，记录词典、语法和土著语篇等形式，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基础。

语言学在人类学特别是在记录语言中的作用及重要影响，就是推动了新的学术领域——人类学的发展。哈佛大学自 1870 年建立人类学系之后，其他重点高校如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都效仿。在这些大学中，最有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因为其创始人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是美国人类学形成时期的领军人物。在博厄斯看来，人类学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包括现今已知人类学诸分支学科，语言学也在其中。

然而，博厄斯一生中语言学是人类学一部分的说法举棋不定。尽管他在记录语言方面贡献巨大，语言记录是他生涯中的主要成就，但他 1940 年曾表示，语言学方法论将不断从狭义人类学中独立发展，而人类学的关注范围将缩小到风俗和信仰研究方面。博氏写道，由于有语言学家的帮助，新语言学将从事“我们（人类学家）正在从事的工作，因为其他人不关心这项工作”（Boas 1904：524）。从某种意义上讲，非人类学家对美洲印第安语不感兴趣，这种见解迄今依然存在。

然而，几年后，博厄斯注意到“民族学”等其他学科也需要专门的方法论，于是就否定了原来的语言学学科可以独立发展的想法。他写道：“纯语言调查是全面调查世界诸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形成时期，语言学像民族学及其他非学科一样，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描写研究美洲印第安语，即描写尚无文字的文化的语言，是人类学的责任。在美国和欧洲，印欧语及其他语言研究曾属于语文学，语法研究属于语言（文学）系的论题。

博厄斯提出的语言研究是人类学一部分的模式，在 20 世纪上半叶一直流行，当时他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罗伯特·劳维（Robert Lowie）撰写的人类学教材均确定了该模式。同时，博厄斯希望并要求他的民族学专业的学生也要记录其研究领域中的部落

语言或族群语言。譬如，民族学者吉恩·韦尔夫什（Gene Weltfish）主要对艺术和物质文化感兴趣，但她1929年在波尼部落作田野研究的过程中，记录了大量的语篇、语法材料和词汇，其中大部分已经发表。同时，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莱瑟（Alexander Lesser）是专门研究亲属关系的民族学家，除了从事主要工作外，还学习记录基在（Kitsai）语。该语言与波尼语相近，属于北卡多语系，能流利运用基在语的当时只剩一人。随后，他记录了大量的语篇、词汇和语法材料，虽然他对自己的语言技能不甚满意，但确实实拯救了基在语，使其幸免被人遗忘。

该时期中，主要受博厄斯最杰出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影响，美洲本土语言研究盛行。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萨丕尔和伦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功劳。布氏是印欧语专家，对阿尔冈琴语作过大量研究。当时，他们还把欧洲研究印欧语的方法应用到美洲印第安语的历史研究上。

该时期的另一主要特征是产生了一批研究美洲印第安语的专家。他们师承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分别研究印第安各语系中的主要语言或语族，其中，享有盛名的是：

- 玛丽·哈斯（Mary R. Hass）：主要研究美国东南部语言；
- 莫里斯·斯瓦迪什（Morris Swadesh）：研究领域广泛，包括：语言记录，如努特卡语、契提玛恰（Chitimacha）语和其他诸多语言，历史研究，包括语言年代学和语言学方法论中的方法问题；
- 斯坦利·纽曼（Stanley Newman）：其语言记录包括加利福尼亚的约库特（Yokuts）语和西南地区的祖尼语；
- 卡尔·沃格林（Carl F. Voegelin）：主要关注阿尔冈语和乌托阿兹特克（Uto-Aztecan）语；
- 哈里·霍杰（Harry Hoijer）：首先撰写一部彤卡瓦（Tonkawa）语语法，该语言是得克萨斯州的一种近乎灭绝的语言；后来大量研究阿萨帕斯坎（Athapaskan）语，特别是西南诸州的阿帕切（Apachean）语。

这些语言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长期信奉以下诸条：（1）在结构框架内记录一种复杂语言，提高工作质量，达到现代标准；（2）运用印欧语

系研究中已获成功的比较方法，开北美一种语系或多种语系历史研究之先河；(3) 语言与文化研究表明，语言学与民族学相互依存，只有掌握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才能充分解释人类语言行为。这种语言与文化研究即所谓语言人类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数年间，萨丕尔和他的学生发表了许多以文化为基础描写语言行为和语体的研究成果。譬如，萨丕尔 (1929) 本人记录了雅拿语男女不同的话语形式，哈斯 (1944) 则描写了科萨提 (Koasati) 语男女不同的话语形式，纽曼 (1955) 记录了祖尼语中的神灵词和俚语词。莫里斯·欧普勒 (Morris Opler) 和霍杰 (1940) 描写了阿帕切人在战争聚会时使用的秘密语，萨丕尔 (1915) 报告了努特卡人的反常话语，卡萨格兰德 (Casagrande) (1948) 报告了科曼奇人的幼儿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同样硕果累累，许多人关注建立新的谱系关系，另一些人则报告了各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譬如，克罗伯 1907 年描写了约库特 (Yokuts) 方言，1916 年描写了阿拉帕霍方言。该时期，论证该领域发展中方法论的论文同样重要，其内容包括霍杰的论文《美洲印第安语分类方法》(1941)、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1939) 和罗伯特·劳维 (1940) 有关土著语言是民族志田野调查工具的论文。

20 世纪中期 “二战”期间，人类语言学研究衰退，因为许多语言学家应征入伍，编写教材，为军事和外交人员讲授战略语言。譬如，玛丽·哈斯研究泰语，查尔斯·霍凯特 (Charles Hockett) 研究汉语官话。

战后人类语言学家重新关注美洲印第安语，虽然实际从事研究的人员有限，但该项研究开始复兴。以往各种同类论题又被重新提出，还有新的进展。有个流行的问题，起初是在战前提出来的，这就是人们本族语的结构与其对世界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语言结构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该问题首先由萨丕尔提出，继而由本杰明·李·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深入讨论，这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或被奉为至尊，或被全盘否定达 50 年之久，迄今仍然引人关注 (Lucy 1992)。

引人入胜的另一论题是，美洲印第安语语义域和土著分类系统研

究。该论题范围广泛,涉及数字系统、性别、语法分类及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分类系统。许多论题名称通常冠以一个前缀“民族”(ethno-),譬如,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民族动物学(ethnozoology)、民族解剖学(ethnoanatomy)、民族地理学(ethnogeography)等等。20世纪60年代,语义域方法被称作“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在许多语域的形式分析中应用,譬如,伦斯伯里(Lounsbury)的波尼语亲属称谓分析(1956),基思·巴叟(Keith Basso)(1990)的阿帕切语类分式动词成分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颜色词的类别研究成绩斐然,保罗·凯(Paul Kay)和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提出了颜色术语发展演变模型假说。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战”后,美国语言学者并不都在大学人类学系工作。仍然在人类学系工作的,有新墨西哥大学的纽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霍杰、印第安纳大学的沃格林和康奈尔大学的霍凯特。在战后建立起来的人类学系,譬如亚利桑那、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堪萨斯等州的大学人类学系当中,通常只有个把或几个语言学教师。

由于种种原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几十年来并不是从事描写和比较研究的语言学者的栖身之地。克罗伯本人长期对语言学感兴趣,早在1942年他就声称,编纂词典已不再适合作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由于玛丽·哈斯研究泰语,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曾在东南亚工作,所以战后,他们二人都在东南亚语言系工作。1953年,该校设立独立的语言学系,哈斯及其他印欧语学者,如亚科夫·马尔吉尔(Yakov Malkiel)(罗曼语)、麦迪逊·比勒(Madison Beeler)(日耳曼语)、默里·伊莫纽(Murray Emeneau)(梵文,印度语)等人,成为该系首批骨干教师。后来在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第一位语言人类学家之后,甘柏兹也来到该系工作。

少数人类语言学者在语言学系工作,多数人类语言学者则在人类学系工作,这种结构反差状况迄今犹存。大多数人类学系都在沿用博厄斯提出的四大研究领域结构,其中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美

洲印第安语而言，除了对其进行语言与文化及社会语言学研究之外，描写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样，在史密森学会人类学系，即后来的美国民族学局，也有若干语言学者，他们保持着该机构长期遵循的传统：记录语言，从事历史研究。

转换语法的出现 1957年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句法结构》一书问世后，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20世纪60年代，转换语法取代了结构主义，成为语言学中的主要范式。结构主义有时也被称作“新布龙菲尔德”语言学。在这一进程中，生成语法学家不仅不考虑结构主义，也不考虑记录研究尚无文字的语言。无论是人类学关心的课题，还是结构上与印欧语相差甚远的美洲印第安语，他们均感到索然无味。大多数语言学系关注的新焦点和新流行语是“理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是研究理论问题，而不是记录语言本体。

该时期持续了约20年，当时从很大程度上讲，大多数语言研究兴趣都聚集在理论上。大多数语言学系已经没有人类语言学教师。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属于例外。

与此同时，随着主流语言学范式的进一步发展，该范式实际上已经完全远离了人类学的关心。很多人类学系对语言记录和语言历史的研究兴趣已经江河日下，因为只有从语言多样性研究向以英语和其他主要世界语言为基础的普遍语法的形式研究转变，才能凸显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在拥有著名语言人类学学者，拥有萨丕尔的学生——譬如，康奈尔大学的霍凯特、耶鲁大学的伦斯伯里、印第安纳大学的沃格林、伯克利语言学系的哈斯——的那些院系，情况则属例外。然而即使在当时，大多数人类语言学家也还是勉强出版了采用结构框架而非生成框架撰写的语法，结构框架如今已经贬值。

当代研究

当代是指20世纪70年代直到现今，语言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语言记录和田野研究 该分水岭表现为沿袭长期形成的传统，记录

美洲印第安语，研究这些语言的历史关系和类型关系，继续从事跨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芝加哥、印第安纳、洛杉矶、得克萨斯等机构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以及颇有分量的语法、词典和语篇集的出版项目，都是语言记录传统中的典范成果。在出版物中，“加州大学语言学丛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的“北美印第安人类学研究丛书”享有盛名。两套丛书均有数十卷。

本时期语言记录传统，有时又称博厄斯传统，已在其他几个国家兴起。最典型的或许是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语言研究成果一直都很出色，这些成果主要是由狄克逊（Dixon）、狄氏的学生以及特罗比（La Trobe）大学狄克逊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完成的。实际上，狄克逊已成为通过田野工作献身语言记录的人类语言学家的化身。在过往的十多年里，狄克逊和亚历山大·艾肯瓦尔德（Alexandra Aikenvald）将其语言研究活动扩大到低地南美洲。甚至美国的一些语言学者诸如杰弗里·希斯（Jeffery Heath）、肯·黑尔（Ken Hale）以及现在在澳大利亚定居的艾伦·拉姆西（Alan Rumsey）、弗朗西斯卡·莫兰（Francesca Merlan）都曾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作过田野调查，记录过很多颇有价值的语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又掀起一场记录所谓“濒危语言”的新运动。10年前该术语就开始流行，当时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必须把目光从只关心印欧语中语言普遍性的单一问题，转移到人类语言多样性的所有研究领域上来，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上鲜为人知未曾记录过的语言中，才能找到濒危语言。同时，语言学者也意识到，未记录过的语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英语和其他占优势的语言正在取代这些濒危语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一种语言消失而来的文化消失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人类学正在不断发展，语言记录和文化记录在人类学研究中尚占有优势。但是，20世纪只有人类学家，通常只是少数人类学家才认识到语言记录的紧迫性。如今，一个多世纪以后，相当一批人已经感到，语言消失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像过去五十多年来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已经成为科学和环境的一大主要问题一样。